

一部研究同乡团体的佳作

读顾德曼教授的《籍贯、民族和城市》

宋钻友 叶斌

会馆是始建于中国明代初期的社会组织，国外学者早就注意会馆的研究。把会馆当作行会（基尔特）的观点在国外学者中流行了很长时间。本世纪五十年代在关于明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会馆的性质再次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仍然把会馆当作工商行会。持这些观点的学者为了扩大明清资本主义发展的规模，忽视了会馆有不同类型，尤其是忽视了会馆有同乡和同业类型的明显区别，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美国学者罗威廉在其关于十九世纪汉口社会研究的重要著作中，厘正了这一错误。罗威廉教授关于地缘团体同乡、同业以及同乡兼同业复合型的分类，对国内学者突破会馆即行会的僵化框框功不可没。当然罗教授的两部大作成就决不仅限于此。

顾德曼（Bryna Goodman）教授的《籍贯、民族、城市——上海的地域网络和特性（1853~1937）》是一部以同乡团体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本书在取材上颇见匠心。从来的会馆研究著作都把时间集中在明清，对会馆这一传统组织在激烈动荡的近代中国起了哪些作用、有哪些变化，以前无一人道及。第二，以上海近代百年地域组织为研究对象显示了作者的精明。汉口和上海是近代中国地域团体最为集中的几个城市之一，尤其是上海，大量地域团体不仅在19世纪相当活跃，当20世纪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时，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这里面有着太多的问题值得探索，有着巨大的学术空间可供作者挥洒才智。

把地域团体与商会的研究相比，可以说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商会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整体政治利益的代表，但商会的基础是会馆，不把商会研究透，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面貌很难说清。同样不研究会馆，资产阶级的不同侧面终究难以得到完整的揭示。

全书分为八章，这里先将各章内容作一简单概括。

第一章：绪论。作者指出，全书主要研究与同乡情谊（乡谊、梓谊）相对应的都市社会结构和行为。首先讨论了籍贯的内涵，具有相同籍贯移民之间的联系。作者指出，籍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会因为移民迁入一个新的居住地，以新居住地代替祖辈的籍贯。对籍贯的强烈认同，使得移民通常回家结婚、为长辈守丧，退休后回到故里，死后渴望叶落归根。对籍贯的认同，使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作者详尽考察了不同籍贯群体（移民群体）的职业分布、居住区域、住房式样、佑护神、戏剧、岁时节令、饮食、妓院、团伙斗殴等。作者对同乡社会不同侧面的揭示，为同乡团体出现的原因，作了充分的说明。

通过对宁波会馆（四明公所）的分析，顾德曼教授认为不少同乡团体实际上由一系列不同的同乡职业团体构成，但职业团体并不只合组成同乡团体，也有不同地域的同类职业团体合组成更大的职业团体。因此，籍贯团体中，同乡和职业（同业）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二十世纪最初十年，虽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团体，如商业联合会、工商同业公会等等，但在这些新形式中都有籍贯团体。作者还讨论了围绕基尔特（行会）的不同学术观点。

第二章：外国殖民主义、移民和骚乱 鸦片战争以后和 1853 年的小刀会起义。作者首先考察了上海开埠以后的移民情况。早在前清时期，上海与北方关山东以及南方潮州地区就有频繁的商业往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客籍商帮纷纷建立同乡和职业团体。上海开埠后，随着洋行的大批北迁，商业贸易重心的转移，广东帮在上海迅速崛起。作者对广东商帮中的两大群体广肇商民和潮州商民在上海开埠初期的商业活动作了翔实论述，分析了他们从事的职业、广东籍官员在上海的影响、广潮商人与同乡官员的结纳、小刀会会众的籍贯构成以及小刀会起义爆发的原因。

小刀会起义失败后，广东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等因卷入起义，被清军彻底烧毁，广潮人被逐出县城，不准在城内居住，秘密会社难以在上海立足。这样的经历给会馆领导人以深刻的教训，从此，他们十分注意培植自己在本地社会的力量，加强与城市里中国和外国政权的联系，把对同乡的忠诚置入更有凝聚力的政治背景之内，同乡情感的涵义完全变了。

第三章：团体、等级和权威 晚清同乡文化中精英与非精英的作用。本章探讨晚清同乡团体的力量和会馆权威的来源。会馆董事的权威来源之一是租界当局的倚重。1902 年，上海一船厂的广东木工举行罢工，一位宁波籍工程承包人雇工上班，遭到罢工木工的恫吓，导致四名广东木工被捕，结果引来一场规模更大的抗议风潮。罢工的持续使外国船厂主蒙受严重损失，及时平息罢工风潮一时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广肇公所出面充当调人，使风潮迅速平静。类似的例子使租界当局和企业主们尊重并鼓励会馆发挥社会调节作用，一定程度强化了会馆的权威地位。

会馆权威的另一重要来源是积极围绕同乡开展活动，作者叙述了会馆三项经常性活动，即殡葬服务、岁时节令的民俗活动、戏剧演出等。对籍贯的强烈认同，使得移民视埋骨他乡为大不幸，运枢回里成为一项同乡团体最重要的工作。对于那些下世后，因家属贫寒无法收殓的同乡先友，各会馆、公所都尽力设立丙舍、山庄，不少会馆、公所还提供免费棺柩。山庄又称义地、义园，移民群体较大，义地义园的占地面积相对也大，土地购置经费大部分来自会馆董事的捐赠。在中国传统的岁时节令里，有两个与会馆有特别的关系，届时，会馆要举行场面可观的礼仪活动，这就是醮和盂兰盆会。作者着重分析了盂兰盆会。每年的七月十五日是所谓的鬼节，这一天生者要向那些饥饿万状的鬼魂施舍食物。饿鬼是一些无家可归的可怜者。盂兰盆会就其实质，是带有慈善性质的社会行为。在晚清上海，每年一度的盂兰盆会是一场风俗盛典。作者对广肇公所和四明公所的盂兰盆会作了具体描述。广肇公所的盂兰盆会例行在广肇山庄举行，其场面之壮观、各种纸扎器物之精致，令人叹为观止，以至后来遭到上海道台丁日昌的指责及普通市民的讥讽。但通过盂兰盆会，广肇公所等会馆的社会影响及在上海同乡中的号召力都得到提高，而这正是盂兰盆会主办者的本意。

会馆董事权威的另一个来源是会馆经常组织慈善活动，并通过斗争来维护本帮商民的荣誉。例如当故乡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或者同乡被人欺负会馆都会挺身而出，尽力给予帮助。凡此种种，都提高了会馆董事的威望，巩固了他们在同乡中的权威地位。

第四章：事务的扩展。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政府管理能力的削弱，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为商人力量的增强，积极参与公众事务的管理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商人精英中的许多人通过购买官爵，提高了社会地位。李鸿章为实施自强计划，大量吸纳买办商人进入洋务企业，把具有民族主义的商人和官员联系在一起。在此背景下，会馆的事务较前有了相当大的拓展。

参与洋务企业管理的会馆买办商人不仅投资于上海和原籍，还投资于其他通商口岸（网络城市），会馆商人的慈善活动也随之扩大到这些城市。1876 年到江苏北部遇到自然灾害时，首先作出反应的是上海的浙江商人。1877 年中国北方发生特大自然灾

害，广东买办郑观应积极参与由浙江商人经元善组织的赈济活动。对于本地的社会公益事业，会馆商人也倾注了很大热情，上海的一些著名慈善机构都得到过会馆的支助。在社会控制方面，会馆与官方积极合作，防止各种骚乱的发生。1907年，中国地方当局关闭了近500个鸦片巢窝，使三、四千人失去生活来源。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秘密结社，扬言要反抗当局。广肇公所及时出资遣返被解雇的同乡，避免了一场潜在的骚乱。

每年的孟兰盆会因汇聚着大批市民，极易引发骚乱。孟兰盆会的组织者会馆采取严密防范措施，既取悦了官府，又维护了这一给会馆带来威望的民俗活动。

会馆与官方的互相依赖，在税收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为筹集军饷，清政府推行厘金制，厘金的征收，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仍继续进行，它弥补了清朝政府巨大的财政赤字，对清朝政府统治的延续意义非同寻常。厘金以及其他税收本身是需要成本的，官方意识到如果没有商人团体介入征收程序，将无法控制走私和逃税。

会馆对税收的参与，保证了政府有稳定的财政来源，而政府的授权也给会馆带来了莫大益处。

鸦片贸易可带来巨大的利润，清政府迫于财政困难，于1858年同意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为遏制猖獗的走私，稳定税收，上海地方政府授权潮阳鸦片商人主持“洋药捐局”，潮阳土商每年按进口鸦片数量上缴洋药捐，作为交换，官方给潮阳土商以鸦片贸易的垄断权。潮阳土商的垄断权在镇江等地受到洋商的有力挑战，但利益的一致性，使得任何企图动摇潮阳土商特权的行动都毫无结果。

除社会控制和税收以外，会馆事务的扩大还体现在参与新的技术和社会团体的变革方面。1870年以后，上海的会馆领导和商业精英成为新技术运用和公众团体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并因此与旨在自强的洋务运动密切相连。广东会馆买办商人唐景星、徐润、郑观应在1870年~1880年因受李鸿章的赞赏特别活跃。在十九世纪后一个十年，宁波商人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同乡商人网络对于洋务企业的创办、生存和发展关系重大。招商局早期的成功依靠官方的财政和广东同乡网络。唐景星通过与徐润以及其他广肇公所董事商人的密切关系，取得了成功，不少人为此大大小小提高了在公司的投资，还有相当多的同乡成为招商局的经营者。广东会馆商人还通过投资创办《汇报》，参与了19世纪的中国新闻变革。

第五章：籍贯团体、外国政权和早期公众的民族主义。1874年和1898年的两次四明公所墓地事件性质有着明显差异。1874年的冲突，只是反对法国，而1898年的冲突反对的是外国人。作者分析了后一次事件中出现的民族主义因素，指出同时代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申报》编者提供了一种理解，认为在这个事件中，宁波人表现了他们作为典型的中国人保卫中国领土一小部分的决心。

民族主义因素的出现和会馆内非精英作用的加强，有着逻辑联系。沈鸿赉，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非精英代表人物，长生会领导人，在1898年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坚持了毫不妥协的立场。他同时致力于四明公所的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使四明公所逐渐显示出向新的社会团体蜕变的迹象。虽然他死后，改革成果逐一消失，但在一段时间以后，在其他籍贯团体那里得到重现。

1874年和1898年两次事件的发生，表明宁波会馆（四明公所）的领导有动员同乡力量捍卫自己利益的巨大能量，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会馆与外国政权的合作关系中断了。恰巧相反，这样的合作和联系继续存在，租界当局仍然依赖会馆的帮助，来维护社会秩序。1910年，上海发生鼠疫，工部局为此发布防疫条例，并派员到虹口中国居民区域挨家挨户作防疫检查，引起心存疑虑的中国居民的不满，最终导致一场风波。事态变得不可收拾后，工部局与上海商会和各会馆负责人进行条例修订的会谈。会馆领导

人据理力争,使修订后的条例便得较易接受。为防止瘟疫蔓延,广肇公所还建立了中国医院。

这个案例同时表明,虽然1902年总商会成立后,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新的角色,但它没有代替旧的会馆和公所在社会协调方面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强有力的会馆如四明公所和广肇公所。

第六章:家乡与民族——反帝和共和革命的动员。清末新政在上海引起一系列城市机构的革新,如以西方和日本为榜样的商会、传播西学的新式学堂、省议会和地方自治运动等。这些新机构不仅把上海商业和政治生活纳入新框架,而且把同乡组织融入了固定的、正规的市级上层结构中。在清末十年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政治组织渗透进了同乡组织,并逐渐占据了领导地位,同乡组织的活动不断增加着与民族建设和“现代性”的联系。上海舞台上活跃着的,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同乡组织的首领,只是他们拥有了新的经济和市政机构的领导身份。

在一连串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中,早期的民族主义与同乡感情相结合,震撼了20世纪初年的上海。这些运动包括1904年的“周生有案”,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和1905年的会审公廨事件。政治活动家用同乡情结来激起爱国行动,再以爱国为号召,来联合各界人士及旅沪各团体。在中国公众与外国当局之间,会馆领袖成了中间人。他们在维护中国权益的同时,也增加了旅沪团体的权力和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同乡和国家的利益是互补的。上海总商会作为一个新的城市机构,在此过程中也发挥一定作用。

上海地区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是由两股势力完成的,一是激进的新知识分子和学生的革命组织,二是温和的原改良主义绅商的教育组织和地方自治机构。这两股势力在1910年底结成了脆弱的同盟,一起完成了1911年上海地区的革命。早期的革命组织几乎全是有同乡纽带连接的。革命者不仅利用同乡关系作为现在的纽带,而且利用同乡情结来进行革命动员,在它们的出版物中,总是把家乡的改造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绅商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力量是在反帝斗争和地方自治运动中形成和发展的。在上海租界,虞洽卿在会审公廨事件后组织了“万国商团华人队”,作为维护华人权利的一个步骤。在华界,李平书等本地人在地方自治运动中成立了“浦东同人会”和“上海商团”。

同乡组织以各种方式支持革命动员和早期“共和”政府。它们的频繁集会为政治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场所。它们印刷传单、刊物,并利用上海原有的新闻机构,传播革命观念,发表招募新兵的通知和致革命领导人的电报。它们为革命军队和政府筹集经费,并在家乡为革命军队招募新兵。革命领袖直接向同乡寻求支持,在革命政府成立之初得到了热烈响应。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夕出席了广东旅沪团体在上海为他举行的宴会,并收到了其他地方的广东团体的大量贺电和捐款。陈其美得到了其浙江同乡(特别是湖州商人)的支持。

与那些新成立的城市机构相比,同乡组织能够'把个人有效地团结起来,为革命提供更有社会基础'的组织资源。同时,由于它们过于强调同乡背景,它们之间的联合是脆弱的,分裂很快发生,有效的革命'政府无法产生。李燮和与他的湖南同乡令陈其美感到嫉妒与恼怒,忠于孙中山的广东人与忠于陈其美的浙江人之间有矛盾,甚至在浙江人内部,也有支持。陈其美的浙北人与支持陶成章的绍兴人之争。因此,辛亥革命没有能创造一个民族新秩序是不足为奇的。

在此时期中,许多社会组织都是用“上海”命名的,但实际上移民对上海的认同是有限的。杰出的商业和政治人物,只要不是移民,都属于同乡组织。他们的自我定位依旧是“寓沪上海商人”并以此身份参与全市范围的运动和城市机构。

第七章:“现代精神”、制度变迁和军阀政府的影响——民国初年的同乡组织。民国初年,同乡组织的结构和社会意义,相对晚清而言,既有明显的连续性,又经历了重要变迁。

辛亥革命在打破了清朝的统治秩序之后,显然没能创造一个切实可行的、稳定的合法秩序来代替它。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机构,同乡组织在1911年以后迅速失去了对高层政治事务的影响力,并减弱了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虽然同乡组织在民国初年非常活跃,但是在一个混乱的政治局面下,事情更多地是用武力而不是用调解来解决的。

随着国体鼎革,同乡组织本身也在转变.同乡之情获得了新的民国语汇、新的制度,并承担起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任务.虽然会馆在整个民国时代继续存在,继续作为同乡团体的象征性中心,一种基础更广泛、形式更现代的同乡组织---同乡会,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尽管辛亥革命的成就令人失望,但它确实催生了像同乡会这样新的社会组织,它们至少在形式上采用了具有民国理念的管理制度,用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公开的会议和公开的记录,来代替少数人掌管、秘密会议和不成文的规矩。在实践上,会馆逐渐侧重于仪式、宗教和慈善方面的活动,而同乡会则在日常事务、家庭纠纷和政治事件等相对比较广泛的领域发挥作用。同乡会声称要"发扬地方自治的精神"不仅仅要为同乡群体中地位较低的人们提供福利,还要改造他们。宁波同乡人在1921年创办了五所中小学,招收宁波子弟,并在同乡会大楼内为成年同乡举办系列讲座,传播现代知识。当然,在同乡会中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同乡中的富裕阶层.这一阶层在民国初年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因而有能力应付更广泛的同乡事务。

尽管会馆和同乡会都声称是面向全体同乡的,但会馆基本上代表商业精英阶层,同乡会基本上代表更广泛的商业团体和知识阶层。学生和工人也建立了自己的同乡组织。学生通过同乡组织便于获得商人的资助,有些学生还利用同乡组织进行政治活动。工人的同乡组织如纱厂中的绍兴帮、宁波帮、苏北帮等等.便于吸收、调度和控制工人。

同乡纽带对于旅沪商人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中生存是有帮助的,然而民国初年家乡对旅沪富商的依赖也着实令他们疲于应付。在民国最初的二十年中,同乡组织是饱受战争和灾害之苦的农村地区接近上海财富的途径.无能为力的地方精英呼吁旅沪同乡解决家乡的问题,上海的同乡组织通常对此作出积极响应。例如宁波同乡会在1921年干预家乡商会的税收问题,潮州会馆在1925年帮助汕头解决金融危机,等等。对民初中国的研究经常把城市和乡村分开研究,实际上,两者经常通过同乡组织进行交流沟通。

第八章:同乡和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建设与大众调控。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把同乡组织作为国民大团结的基础,五四运动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有根据的。而"五四"及其以后的历史同样证明,同乡组织的联合是零碎而短暂的,不可能由此创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大众联盟"。同乡组织的政治活动能力,与国家权力的大小(或者说中央政府的强弱)有关。在国家权力比较强大的南京政府时期,同乡组织的政治能力要比五四时期小得多。

在五四运动中领导罢课、罢市、罢工的社会联盟的背后,都有同乡组织的活动。那些按照职业联合起来的比较著名、比较"摩登"的社会组织.如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等,都以同乡组织作为构成要素。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是33个组织的联盟,其中19个是同乡组织。北京五四事件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就召开"国民大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学生平息众怒,又致电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要求拒绝签字。在随后的抵制日货和"三罢"斗争中,同乡组织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上海总商会在6月10日要求停止同乡会罢市,但广东、宁波和山东的同乡会拒绝执行,一直坚持到北京政府将"卖国贼"撤职为止。

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新的组织形式,如商业公团联合会、劳工组织和政党,在政治生活和社会动员中成为发动者和中心,取代了(不是取消了)同乡组织的位置。这很明显是从五卅运动开始的。在五卅运动中,会馆和同乡会的举措类似于1919年,但它们的作用被工会和共产党的活动盖过了,它们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

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蒋介石1927年的清洗,镇压了上海工人运动和共

产党组织,严重制约了群众性政治组织的发展.与此同时,同乡组织却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重新活跃.在新的国家机器制约下,同乡组织是30年代初广受欢迎的民众团体,在表达公众意见和进行社会动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甚至还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对政府作些批评.浦东同乡会是30年代初上海的一个历史性产物,是由强有力的人物支持或组织的规模庞大的同乡组织的代表,标志着同乡组织新的发展趋势,其成员不一定来自浦东.在"八一三"抗战中,同乡会在救济难民和支援军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整个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同乡组织被理解为隶属于相对"国家"而言的"社会".同乡会自认为是民间团体、社会工团,政府也把它们列为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这样的定位对双方都有用处,掩盖了它们之间互相利用、互相渗透的关系.在同乡会的名册中,有一大批政府雇员甚至政府要员.同乡组织并不是向人们提供集体认同的唯一组织形式,但是由于其规模、拥护者、合法性和易接近性,它是一种特别有用且普遍存在的组织形式.为数众多的拥护者,不仅是同乡会的重要资源,也使它们成为真正的"民众团体".既珍惜同乡之情,又赞成现代市民和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同乡会缓解了现代政治经济组织的无序状态.它们被视为合法的市民组织,通常不是被压制的对象,因为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同乡会得以继续存在,还因为它们有时对国民党的统治是有用的.它们不仅在上海市政府无力顾及的领域提供福利和社会服务,而且还积极推动国家项目,是新生活运动的宣传机构.最后,同乡会还有一个存在理由,那就是促进地方自治,为在全国实行宪政作准备,而宪政是民国政府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同乡会和国家的关系,并不表现为自治,而表现为部分自治、互相渗透、互相协商.这样一种关系需要以一种不同于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念的权力概念来含摄.因此概念的重构.对于理解南京政府时期市民活动的能力及其局限,是十分关键的。

从我们颇为粗疏的介绍中,不难领略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

本书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试作一简单评论。

从章节的安排看,本书结构严密.第一章作者论述了籍贯文化的基本内涵,讨论与籍贯有关的概念.从第二章起,作者按历史顺序,论述了不同阶段籍贯团体的活动.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作者紧紧抓住对籍贯内涵变化的考察.作者强调在发展中、变化中去把握同乡情谊在团体中的影响力.这种研究态度相当科学,也更容易揭示事物的本质。

正因为作者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所揭示的籍贯团体的特性,也就有着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简单的教条.在这里我们感到十分满足的是,作者不仅告诉我们,同乡情感在什么地方有影响力,什么地方没有.而通常我们读过的论著,只告诉我们事物的一面.既如同乡团体,一些论著毫无根据地扩大乡谊的作用和影响力,背离了历史事实.按照顾德曼的研究,同乡情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第一章她以大量材料论述了同乡情感在都市生活中的纽带作用.步入二十世纪,尽管新型团体不断出现,但只要有一种新型团体,就会有一种以籍贯为基础的同类组织,同乡情感可以成功地与现代社会融合.作者又告诉我们,同乡情感影响力的限度,同乡之间也有严重的利益冲突,会馆内精英与非精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可以大相径庭.此外,对于会馆董事来说,对同乡情感的忠诚,并不妨碍他们与中国地方政府和租界当局妥协与合作。

民族主义与同乡情感的关系是本书论述的重点之二.作者认为同乡情感并不排斥中国的民族情感.作者分析了民族主义对同乡团体的影响,使人觉得相当精彩的是作者从同乡团体的内部结构中找出民族主义在其中成长的基础,这就是作者对精英与非精英在会馆中影响的分析.非精英在会馆中曾经处于下层和从属地位,随着民族主义影响的扩大,外侮的变本加厉,会馆中非精英的政治意识逐步觉醒,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非精英终于在上海的政治舞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作者还将非精英与精英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做了比较,指出非精英常常在会馆内起着推动变革的作用。

作者对四明公所长生会的研究堪称案例研究的典范。人们对长生会并不陌生，但作者通过对长生会创办人沈鸿赉思想倾向的分析，指出长生会这一非精英人物组成的四明公所团体会员之一，在四明公所向现代社会团体变革中的作用。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顾德曼教授在本书探讨的第三个大问题，围绕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近年来海外中国史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吸引学者人数只众、发表文章之多，都是罕见的。这股热潮也传到了国内，由于对国外理论并不熟悉，不少人在谈市民社会是往往不着边际。顾德曼教授作为一位对中国近代史有深厚素养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自然有独到的见解。在本书中，顾德曼教授并不直接回答上海有没有市民社会，而是通过同乡团体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同乡团体与中国地方政府及租界当局的关系，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对小刀会起义后几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作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和租界当局都希望会馆在维持社会秩序以及城市管理方面发挥作用，会馆因与政府及租界当局有利益的一致性，也乐意发挥这样的作用。但会馆绝不允许政府及租界当局侵害自己的利益。会馆与政府及租界当局的合作，增强了会馆在同乡中的权威地位，而会馆对自身利益的守望或维护，成为会馆董事力量的来源。

勉力读完全书，不能不为顾德曼教授的学术功力折服。近年来笔者之一也曾浅尝辄止研究过部分同乡团体，比较我们接触过的论著，可以负责任地说，这部学术著作堪称同类专题的扛鼎之作，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解，不少论点极具启发，值得涵泳玩味。

作者在第四章收税一节分析了潮阳土商获得上海鸦片贸易垄断权的原因，并据此指出会馆与地方政府存在利益上的一致性。这一分析从资料的征引到论点的得出，都无懈可击。这里我们就掌握的材料作一补充。

潮州土商对鸦片贸易垄断权的获得，与他们积极为清政府提供剿灭太平军的军饷有关部门。1857年，清政府为筹集军饷，派赵德辙前往上海劝捐。赵德辙抵沪后，报请朝廷设立“广潮义捐”，将鸦片贸易由暗转明，由负责经销的广潮土商每箱上缴一定捐税，最初定为每箱十两，后提高到每箱二十两、三十两，义捐视为商民对朝廷的“竭忱报效”，可向朝廷依海疆奖例请奖。每箱义捐提出贰两，作为局外经费，实际上就是回扣，由广潮土商巨头分享。资料表明，开义捐局二月，即获豆规银十万两，据统计，1857年全年广潮义捐为53万两，1858、1859年为140余万两，占同时期上海捐饷总量的25%。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畀予潮阳土商以垄断权的原因所在。

对于这个问题，顾德曼教授在书中已说得很清楚，因属同好，不揣浅陋，提出来就教顾德曼教授。